

一部恢宏的爱国主义教科书

——略论张謇的爱国主义思想和业绩及其现实意义

金 城

张謇，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光辉而响亮的名字，毛泽东生前曾满怀深情地告诫后人“不能忘记张謇”。提起张謇，人们总是习惯地冠以清末状元、我国近代著名的实业家、教育家，这对于啬公来说，自然是当之无愧的。不过，笔者认为这还不够，张謇先生办实业、兴教育、举公益，都有其深厚的进步思想之底蕴，这就是他那热烈而赤诚的爱国主义思想和勇于、善于开拓的创新精神。我们研究张謇、学习张謇、传承张謇、弘扬张謇，应该在这一方面予以重点肯定和科学提升——张謇理当是我国近代著名的实业家、教育家、杰出的爱国主义思想家。本文试就张謇的爱国主义思想及其实践以及对今人、后人的教育和启迪论述一二，恳请各位专家学者赐教。

一、张謇爱国思想的形成及主要内容

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悠久而深厚的爱国主义传统的民族。张謇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儒学教育，有远大的理想和抱负。他十六岁中秀才，二十七岁中举人，此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等自古以来中国有识之士以天下为己任、以“精忠报国”为追求的强烈的爱国思想对张謇的影响和熏陶很深。

张謇成名之前，曾在淮系庆军统领吴长庆门下担任过较长时期的幕僚。张謇忠诚踏实、工作勤勉，吴长庆倚为心腹。朝鲜壬午兵变之际，吴长庆奉调赴朝平叛，张謇随行，始终参与了平乱，作出了重要贡

献。由于表现杰出，一时名声大振。这一段时期，是张謇开始接触晚清政府之内幕和当时时局之焦点——中日关系的起点，也是他走上政治舞台、了解社会时弊、积累社会经验的前期阶段。正是这一段时期，张謇凭着对儒学的刻苦钻研，吸收了中华民族优秀的思想文化传统，特别是爱国主义思想。他利用供职于吴长庆军幕的有利条件，对清末政局和中日关系进行研究，逐步形成了比较正确的见解，为后来的政治生涯和创业道路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张謇长期供职幕僚，但并没有放弃“学而优则仕”以科举进身、敬业报国的志向。1894年张謇赴京参加恩科会试，取一甲一名状元，授翰林院修撰。从此，张謇成名，中国南通——长江入海口的苏北平原上又诞生了一名状元，往后，他的思想和事业，更使他成了享誉中外的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名人。

就在张謇状元及第之年，日本侵略者肆意挑衅，中日战争爆发，史称中日甲午战争。此时，封建王朝腐败无能，慈禧、李鸿章等主和派卖国求荣，祸国殃民。战争的结果是偌大的大清帝国却败给了一向被中国人视为弹丸岛国的日本，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在这关系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大是大非面前，张謇与帝师翁同龢一起支持光绪皇帝主战，为争取反侵略的胜利积极奔走，献计献策。同时，对李鸿章妥协退让，主和避战，贻误军机，进行大胆的揭露和抨击。他在奏折中痛斥李鸿章对日一味妥协，误战误和。张謇说，综其前后心迹观之，则二十年来，败坏和局者，李鸿章一人而已。最后，张謇断论，北洋大臣实非天下唾骂之李鸿章所能胜任。所以，他重申自己的主战立场，强烈呼吁光绪帝圣明裁断，罢斥李鸿章，另简重臣，以战定和，因人心而申国势。甲午之战，中国败北，应了张謇早年的预言：中国大患不在外侮之纷乘，而在自强之无实。对《马关条约》的签订，张謇更是痛心疾首。他说，《马关条约》割地驻兵之事，如猛虎在门，动思吞噬，赔款之害，如人受重伤，气血大损，通商之害，如鸩酒止渴，毒在脏腑。甲午前后，张謇忧虑朝政腐败、国力衰弱，痛恨李鸿章之流主和退让，误国卖国。张謇不忍凌辱、誓雪国耻，主张立国自强，追求中华民族复兴的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溢于言表，可歌可敬！

康梁变法（亦称戊戌变法）时期，张謇对维新运动是同情和支持

的，并参与了翁同龢关于维新变法的一些策划。张謇熟悉宫廷内幕，担心维新派不是顽固派的敌手，曾一再劝康梁等不要轻易举动。维新运动期间，张謇的爱国主义思想主要是主张改革，这在后来他代刘坤一、张之洞草拟的《变法平议》中即有较为完整的体现。1903年，张謇东渡日本考察，著有《东游日记》，其除旧更新变法的思想就较为成熟了。除旧更新变法，其目的就在兴利除弊，励精图治，强国富民，这在当时的“士大夫”阶层中，实属难能可贵。

辛亥革命前后，张謇的爱国主义思想，主要表现在政治主张上从“立宪”转变到了“共和”。他对袁世凯因接触交往较多，开始予以支持。但当袁世凯公然倒行逆施，复辟称帝时，他毅然与之分道扬镳。其后，张謇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袁氏自毙，此正天与我民以教养之机也。”其意思是说，袁氏命归黄泉，人们从中看到了国家的希望。在给黎元洪的信中，张謇又称：“今试思洵上何以致死，南北之军、川湘之民，何以丧生而覆产？举国之农商，何以陷于困厄？谁阶斯厉？天下知之。”这既是对袁世凯的批判，也是对继任总统黎元洪的警告。谁叛民图帝，必然身败名裂，遗臭后世。

张謇与孙中山的接触和交往不多，但他对这位中国革命的先行者的评价相当高。对孙中山先生的政治远见、恢宏大度、矢志革命、天下为公尤为钦敬。其时，内忧外患，国家备受列强欺凌，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民国成立以后，张謇认为，其时能拯民于水火，救国于灾难者，除孙中山而外，找不到第二人。孙中山对张謇亦十分敬重，民国临时政府成立时，孙中山任命张謇为实业总长，并曾将自己的照片亲笔书赠张謇。孙中山逝世后，张謇率先在南通举行了追悼会。他在悼词中说：“孙中山是手创中华民国之人，是国民党的领袖。既手创民国，则凡属中华民国之国民，谁不该敬佩他！谁不该纪念他！”“孙中山不畏难，不怕苦，不耻屡仆屡起，集合同志，谋举革命，千回百折，备尝艰苦，至辛亥年，事会凑合，卒告成功。”孙中山之革命，则为国体之改革，与一朝一姓之更变迥然不同。所以，孙中山不但为手创民国之元勋，且为中国及亚东历史上之一大人物。”其人“不贪财聚蓄，不自讳短处，亦确有可以矜式人民”。这些话，高度评价了孙中山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和大公无私的崇高品德，充分肯定了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这是张

謇在这一历史时期顺应历史潮流，忧国忧民，拥戴革命的爱国先进思想的鲜明体现。

以上是张謇在重大历史事件中爱国主义思想的概述。而张謇的爱国主义思想最集中、最完备的展现和践履，则是在他弃官还乡，创建实业、兴办教育、义举公益等一系列辉煌的事业之中。

二、张謇爱国思想的践履及辉煌业绩

张謇身处清末民初，又是 19 世纪与 20 世纪的交替之际。特定的国内形势和世界形势，造就了一批又一批忧国忧民、发愤图强的有识之士。张謇是封建士大夫阶层中脱颖而出，站在历史潮流前列，矢志强国富民的优秀代表。对外，他积极探讨和吸取欧美、日本日趋富强的经验；对内，则审时度势，剖析国情，认识到了中国贫弱的原因。诚然，作为历史人物的张謇，他当时只能主要地从经济的角度去认识和分析问题。他认为国非富不强，富非实业不张，中国应该向日本学习，日本之学西法也，自工始。自工始者，学其用机器，并学其造机器。学其造机器故有各工艺学校；学其造机械，故有各铁工制造场。工业进而后及练兵，所以，日本三四十年之间，由小国而跻于强大矣。基于这种认识加上他对清廷内部腐朽、黑暗、昏庸、无能的了解，张謇毅然决然地放弃了光宗耀祖的高官厚禄，返回故里南通，走上了“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道路，这是张謇爱国主义思想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最了不起的成功实践。

张謇回乡创办实业，在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和国内封建主义势力的双重压迫下，困难重重，步履维艰。但他意志坚定，机智筹划，顽强拼搏，百折不挠，东奔西走，勇往直前，生命不息，奋斗不止，毕终身之精力，终于创下了强国富民的宏伟大业。他创办的实业，从大生纱厂即纺织工业始，广及盐垦、植棉、冶金、电力、水利、渔业、交通、运输、商业、金融、外贸等有关国计民生的各个行业。因此，张謇成为我国近代民族工商业界杰出的代表人物和先驱领袖。毛泽东生前谈到民族工业时说，讲轻工业，不能忘记张謇，其缘由即在于此。

张謇在创办实业的同时，又尽其财力，千方百计兴办学校和社会文化公益事业。他有一个很英明的思想，即“父教育而母实业”的主

张，这一思想，富有远见，符合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此乃中国近代正确阐述教育与实业之辩证关系的一大科学思想。在他的艰苦努力下，南通地区先后创办了小学校 370 余所，中等学校 6 所，高等学校 3 所，特殊教育学校 2 所，职业教育学校多所。学校之多，设备之完全，人民知识之增进，远非他处所能及。同时，他还积极参与筹建复旦学院和河海学校。在社会文化、公益、慈善事业方面，他创办和建设了南通博物苑、气象台、图书馆、剧场、育婴堂、敬老院等一大批场馆，业绩十分显赫。张謇对教育、文化、社会公益事业的历史贡献，在与他同时代的仁人志士中是首屈一指的，许多方面开了我国近代史上的先河。他把南通建设成了当时全国的一个模范县。

三、张謇爱国思想的地位及现实意义

张謇强烈而赤诚的爱国主义思想及其成功的实践，是精神与物质的有效统一，是他留给国家、留给社会、留给人民、留给家乡、留给后人的一笔无可计量的宝贵遗产，是一部恢宏的爱国主义教科书，这在今天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仍具有重大意义。

列宁曾说过：“爱国主义是由于千百年来各自的祖国彼此隔离而形成的一种极其深厚的感情。”爱国主义历来是动员人民鼓舞人民团结奋斗的一面旗帜，是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精神支柱。我们党极其重视爱国主义教育，在革命战争年代，领导人民英勇拼搏，艰苦奋斗，流血牺牲，前仆后继，就是为了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和人民的幸福。新中国成立以后，党领导人民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并不断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途径和经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终于找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最基本的目的就在于国家的强盛、民族的振兴和人民的富裕，最终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一切的一切，其基调就是爱国主义，爱国主义是最基本的精神动力。我们极其重视爱国主义教育。新中国成立伊始，毛泽东同志就提出了以爱祖国、爱人民、爱护公共财产为全体公民的公德。后来，党和国家又确立了思想品德教育的“五爱”方针。邓小平同志指出：“中国人民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以

热爱祖国、贡献全部力量建设社会主义为最大光荣，以损害祖国利益、尊严和荣誉为最大耻辱。”1983年，党中央颁发了《关于加强爱国主义宣传教育的意见》。1990年，江泽民同志在纪念“五四”爱国运动的讲话中指出，继承和发扬爱国主义精神，要体现在实际行动中，要树立高度的民族自尊、自信、自强精神。他多次强调要加强对青少年的中国近现代史、党史和国情教育。1994年，党中央又颁布了《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国家颁发的《教育法》、《高等教育法》也对爱国主义教育都作了明确的规定。

这一切充分说明爱国主义教育是我们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旋律之一。我们要继承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优良传统，根据党和国家关于新时期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规定和要求，在更高的起点上，以更新的内容把爱国主义教育抓细、抓深、抓实。继承和弘扬张謇的爱国主义思想及其实践，是我们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笔者所在的南通工学院，源于张謇先生在1912年创办的南通纺织染传习所，后历经风雨几易校名，如南通纺织专门学校、南通大学纺织科、南通纺织大学、南通学院纺科 至今已近90年，在我国高等教育史上堪称历史悠久的光辉一页。因此，我们组织师生学习张謇的思想，弘扬张謇的精神，有得天独厚的条件。1977年复校以后，我们一直把张謇思想和张謇事业作为一部恢宏的爱国主义教科书，在师生、校友中间以及社会上广为宣传教育。近些年，又将其列为学校贯彻落实中央颁发的《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的重要内容之一。其主要措施为：

第一，历年新生报到后，在入学典礼上必向新生宣传学校的创始人、先校长张謇先生的思想和业绩。

第二，组织学生参观张謇业绩陈列展、南通博物苑、南通纺织博物馆、海门常乐镇张謇故居、南通南郊啬园（即啬公墓）濠南别业的有关展览、南通国棉一、二、三厂、沈寿艺术馆等等。这些地方已经成为对大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固定基地。

第三，在校内，设有校史陈列室。陈列室的第一大部分即为张謇生平、思想与业绩介绍和张謇、张警、张孝若等一直到张敬礼任校长时期（1912~1952年）艰苦创业、勤俭办学的有关资料。

第四，校园内建有张謇先生亲笔题写的校训纪念碑，校训为张謇先生于民国三年四月（1914年5月）亲笔所题，内容是“忠实不欺，力求精进”。此校训引导了一届又一届校友发扬忠于科学、忠于实际、忠于事业、尊重教育规律、探索治校办学新路和以诚相待、不奸不诈的为人之道；帮助和激励了一届又一届的校友养成学习理论、把握实际、手脑并用、精益求精的治学态度和不图安逸、不避艰难、勇于实践、积极进取的工作作风。这一校训，在今天，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它与现在南通工学院“团结奋进、刻苦严谨、求实创新”的校风融会一体，教育、培养和熏陶着新时期一批又一批的莘莘学子成长为祖国现代化事业高素质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第五，学院设有张謇奖学金。每学年都奖励一批品学兼优的学生。颁发张謇奖学金，其意义远不止奖金本身，而更在于张謇爱国主义思想及其业绩的传承和延伸，它标志着张謇的思想和事业将代代相传，永葆青春。1997年八十五周年校庆时，学校为答谢和纪念向张謇奖学金基金委员会捐赠的校友、社会贤达和有关企事业单位，特建造了“功德碑”，碑文写道：“先辈啬公，谋略英明。实业兴邦，教育先行。一九一二，纺科诞生。八十五年，桃李盈盈。南工园内，芝秀兰馨。英才辈出，七千余人。新老校友，恋校思思。助教奖学，义重情深。社会贤达，慷慨捐赠。张謇基金，功德彪炳。不胜泥谢，师生铭心。立碑勒石，永留芳名。壮哉伟绩，昭示后人。特此为序，感仰云情。”

奖学金和功德碑，是耸立在校园内的一部弘扬张謇思想、精神与业绩的立体教材。

第六，在校内专门正式开设“张謇研究”选修课程，学生选修者十分踊跃。学校挑选了一批政治上坚定、业务上过硬、作风上优良的教师主讲这门课程。讲张謇的生平、张謇的思想、张謇的业绩、张謇的历史贡献和张謇的当代价值等内容。

第七，学校加强了张謇研究工作，并成立了张謇研究所，形成了一支实力较强的张謇研究工作者队伍，成果颇丰。

第八，从1982年起，每五年举行一次大规模的校庆活动，全国各地及海外的新老校友云集母校，缅怀先人张謇，共抒同学情怀，同议母校振兴大计。每次校庆，都是在校的师生员工和广大新老校友学习、

继承和弘扬张謇思想及其业绩内容最集中、氛围最浓烈的时刻，历次校庆，都升华和光大了张謇的思想和业绩，缅怀张謇、学习张謇、继承张謇、弘扬张謇的校庆主题深深扎根在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新老校友之中，在社会上也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通过这一系列的活动，张謇忧国强国的爱国热忱，泽被乡里的爱民情怀，严谨求实的优良学风，敢为人先的开拓精神，力求精进的坚强意志，忠实不欺的高尚情操，教育、实业的丰厚遗产，被一代一代地传承了下来，激励和培育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代又一代新人。

张謇先生的嫡亲孙张绪武先生曾经说过，“先祖父张謇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不求高官厚禄，毅然走上办教育、办实业、兴科技、兴社会事业的爱国强国的道路，历经艰难和曲折，从未动摇，奋斗终生。但张謇的理想和追求的事业，只有在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才得以实现。我们研究张謇不是让人们回到那个时代，而是为了吸收养分，包括经验和教训，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迎接 21 世纪，创造未来更灿烂的祖国。”这段肺腑之言，语重心长，对于我们学习、研究张謇的思想和事业，继承、弘扬张謇的思想和事业，对于我们学好用好张謇这部恢宏的爱国主义教科书，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原刊于《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先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2001 年）

张謇爱国主义思想的时代特征

张廷栖

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爱国主义始终如一地哺育和陶冶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的情操，成为中华民族生存、壮大和发展不可缺少的精神支柱。爱国主义犹如一艘巨轮，满载炎黄子孙，劈波斩浪，建功立业。近代张謇就是这方面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张謇在事业上的抱负和追求，就是以爱国主义为动力的。爱国主义既有其深刻的历史连续性和继承性，又具有其鲜明的阶段性和时代性。这位近代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和所有的爱国主义者一样，其一生行为举止总是和当时的历史使命紧紧地结合在一起。张謇生活的时代正处在中国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急剧变化的过程之中，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奋发自强成为这一时代的主旋律。在此条件下形成的张謇爱国思想，可概括为如下几个特征。

一、张謇的民族忧患意识以救亡图存为特征

张謇的一生可分为三个阶段。在 16 岁之前，他是一个朴实、单纯、倔强而又不谙世故的农家读书子弟，这是第一阶段。16 岁以后至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夕是第二阶段。他 16 岁冒籍如皋张氏，应县、州、院试皆中，取得生员资格。在这以后，他一方面继续学习、应试、写作，另一方面则进入仕途，先担任江宁发审局书记，后长期在广东水师提督吴长庆军中当幕僚，参赞军机，与此同时他参与了更为广泛的社会活动。这个阶段是他的成长时期。一方面他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如“卧薪尝胆，自强不息”的奋发进取精神、“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民族气节情操的影响；另一方面他出身低微，更贴近平民百姓，面对外界战事不息，列强继续侵略并企图瓜分中国的民族危机不断加深，因此

他在 16 岁以后，便“无时不在忧患之中”。随着阅历的加深，交往范围的扩展，张謇的这种忧患意识也不断得到增强。19 世纪 70 年代西方列强不仅把中国一些邻国掠夺为殖民地，同时还大举向中国的边疆地区推进。19 世纪 80 年代西南边疆和东南沿海燃起了中法战争的烽火……一个个不平等条约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面对列强的这种疯狂的侵略和掠夺，张謇深感中国濒临亡国灭种的危险。他忧国又忧民。尤其是在 1887 年他协助开封知府孙云锦治黄导淮救灾，深入灾区察看灾情，目睹民众的悲惨生活景象，心情十分沉重和忧伤。当他向孙报告灾情时不禁泪如雨下。这种忧国忧民的强烈情感激励他为救国救民奋斗拼搏，促进他逐步认识到救亡图存是近代中国最紧迫的任务，因而他的爱国思想没有停留在眷恋家乡故土、痛惜祖国河山惨遭蹂躏的爱国情愫上，而是升华为寻求强国富民的早期现代化道路。所以这个时期忧患意识激发了他的危机感和救国紧迫感。由此进一步引发了他“舍我其谁”的社会使命感和责任感，因而产生了改良农业，采用机器和筹建公司的愿望。中日甲午战争的爆发，对张謇更是一个极大的震撼，促成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转折，从此开始他人生的第三阶段。当时的张謇同其他中国人一样，认为日本不过是东瀛弹丸之地。然而就是这个被中国瞧不起的东邻蕞尔小国，竟敢进攻堂堂的中华帝国，使中国人蒙受了空前的奇耻大辱，对此，张謇更有切肤之痛，那年他刚金榜题名，成为新科状元，便不顾个人安危，大胆地单独上《推厚祸娱防患未来请去北洋折》，从四个方面指责李鸿章一贯主和卖国，而且还一贯败坏和局。他愤然谴责：“试问以四朝之元老，筹三省之海防，统胜兵精卒五十营，设机厂、学堂六七处，历时二十年之久，用财数千万之多，一旦有事但能漫为大言……曾无一端立于之地，以善可和之局，稍有人理，能无痛心？”将李鸿章的谬误与罪行揭露无余。这一爱国行动反映了张謇本人对侵略者和卖国贼的义愤，对民族和国家命运和前途的忧虑。中日甲午战争期间，尽管张謇循例丁忧回乡尽孝，但他仍以十分焦急的心情密切关注着北方战局的发展：“一闻海上风鹤之惊、北方挫衄之频、良友愤时又叹嗟之书、深宫痛哭罪己之诏，当食辄辍，中夜忽起，糜心碎胆，不知所云。”得悉《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后，张謇深受刺激，不仅在日记上一条一条记下《和约》十款的主要内

容 并指出：“几罄中国之膏血 国体之得失无论矣。”针对《马关条约》准许外商在中国内地办厂，张謇更加忧虑地指出：今更以我切肤之痛，益彼富强之资，逐步吞噬，计日可待。直至 1903 年出访日本参观春帆楼看到李鸿章“海岳烟霞”的题词时，仍满腔悲愤写下了“寄语游人须记取，春帆楼上马关前！”的爱国诗句。张謇的这种忧患意识越强，承受的现实压力就越大，救亡图存，发奋图强的主张就越强烈。张謇在这种思想情感的指导下，逐渐走上了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道路，或者说张謇后来事业上的成就是他的救亡图存的忧患意识这一爱国思想进一步发扬光大结出的硕果。

张謇同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近代著名的历史人物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就是甲午战争强化了他们的忧患意识，从而将忧国忧民之情，转化为爱国爱民之心、报国报民之志和救国救民之行，但他们不同的地方则是救国图存的具体道路各异。以康、梁为代表的公车上书运动，促使维新思潮走向高潮，他们认为挽救民族危机的办法就是维新改革，这对于唤起民众的爱国热情起到了难以估量的作用；在维新思想迅速传播发展形成一个群众性的爱国救亡运动的同时，又促成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主革命思潮的兴起，主张和宣传用革命的暴力推翻旧的统治者，建立资产阶级的共和国。维新与革命是通过改革生产关系来达到发展生产力的目的，而张謇与康、梁和孙中山所不同的地方是，他更多地想通过直接发展生产力来达到救亡图存、强国富民的目的，因而表现为具体道路的不同。

二、张謇的危机意识与自强精神的高度统一

近代中国受列强的侵略，由原来的独立国家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由原来的文明古国变成了落后的弱国。在这一国家衰落、社会滑坡的时代需要有自强不息的毅力振兴民族。然而这个时代存在着两种错误的文化心态：虚骄与自卑，这是套在中国人身上的两副沉重的精神枷锁。中华儿女一贯发奋自强，张謇在民族优良传统的影响下，超越了虚骄与自卑。他面对现实，认识到在中华民族、社会和文化的危机中孕育起来的忧患意识不是在悲愤中绝望，同遁入寂寥佛门和老庄世界去伴守青灯古佛的出世人们不同，与坐而论道抒发愤世

嫉俗之感慨的文人也截然不同，做到了忧愤而不妄自尊大，忧愤而不自暴自弃，忧愤而不悲观绝望。他在总结二次“鸦片战争”失败的历史教训以后，认识到落后就要挨打的规律，确立了反对外来侵略、挽救祖国的危亡，必须首先自强的观念。早在 1879 年由他起草的《代夏学政沥陈时事疏》中就认为“中国之大患不在外侮之纷乘，而在自强之无实。即如今日诸夷逼处，环伺眈眈，恫吓要求，累岁相望。其宜战而不宜和。”也就是说，他在吴长庆军幕生涯中已认识到受列强宰割的根本原因是国家衰弱，救国之道就是自强。他的自强与当时喧闹甚烈的洋务运动口号中的“自强”有本质上的不同。他谴责洋务派“日日议自强，而有事曾不能一战，且资数百万仇敌，缓词乞和，耗于无用。过此以往，虽更十余年，其又奚从而自强也。”如何自强，李鸿章认为：“泰西以商立国，商务之盛衰，即国势强弱所由判……年来日本步趋泰西，亦四出通商，以为利国之本。”张謇针锋相对地批驳：“世人皆言外洋以商务立国，此皮毛之论也。不知外洋富民强国之本在于工，讲格致，通化学，用机器，精制造，化粗为精，化少为多，化贱为贵，而后商贾有懋千之资，有倍徙之利。”他认为：“商务救国”不足取，而把发展工业提到救国的首要位置，“非兴办实业不足以自强。”他认为空口说白话的爱国是没有多大用处的，“爱国救国之挚，注意提倡国货，振工商而挽权利，尤佩远谋……若空言抵制抵制，则彼一物而我无物，抵且不能，制于何有？”面对国家和民族的严重危机，向来有两种不同的态度，一种是自卑而丧失信心，最终堕入民族虚无主义，有的甚至蜕化变质成为民族的败类；另一种态度是树立强烈的危机意识，并将爱国的热忱升华，激发自己对社会的责任感和历史的使命感，当现实的压力越大时，发奋的使命感也越强烈。张謇所采取的态度就是后者。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他一方面主张革新政治，积极参与《变法平议》和立宪运动，另一方面从兴办实业入手，孜孜不倦地努力建造一个新世界，直至他生命的最后一息。他的危机意识就这样与自强毅力高度地统一起来。

三、张謇的爱国思想具有开拓与创新的双重特征

封建社会长期的崇古法祖，因循守旧，闭关自守，固步自封，闭目失聪，使我们伟大的文明古国到了近代远远地落在世界潮流的后面。

中华民族在失败中觉醒，在苦难中奋起。民族的生存，国家的兴旺，除了与列强抗争之外，更需要民族的开拓创新精神。张謇顺应时代的要求，在同列强的抗争中逐步形成了这种精神。张謇作为已经取得功名的士大夫，完全可以高官厚禄，无所事事，终此一生。然而，在爱国思想的驱使下，他冲破封建社会长期以来“重农抑商”的传统观念，毅然兴办实业。他开辟并走上状元办厂道路以后，大批的官僚、绅士和商贾纷纷投身于创办近代工业，形成了一个近代企业家的群体，他本人也就成了中国近代工业开拓者之一，新式教育的先行者。

张謇的开拓创新精神，不仅在同列强的抗争中产生，也在同列强的抗争中巩固和发展。他走上实业救国道路是为了反对侵略，这在大生纱厂的《厂约》中表达得很清楚“为了不至‘通产之棉’为日厂‘花往纱来’，……捐我之产以资人，人即用于我之货售我”而“沥血肥虎”，所以自己办纱厂。大生纱厂创办成功，有了经济效益，这对他的开拓创新精神更是一个很好的激励。在父教育、母实业，实业与教育迭相为用的思想指导下，他又从事教育等事业的开拓。张謇认为“欲雪其耻而不讲求学则无资，欲求学问而不求国民之教育则无与，欲求教育普及国民而不求师则无导”“办教育‘尤须先从师范始’”；“师范为教育之母”因而于 1902 年 5 月，不畏艰难，冲破重重阻力兴办了全国第一所民办本科制师范学校，推动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自此之后，张謇认为凡是社会发展和反对列强侵略所需要的都大胆尝试，在这种精神支配下，南通一县出现了许多全国第一的文化教育事业。如第一个中国人办的博物苑，第一所独立设置的纺织高等学校，也是第一所厂办大学，第一所以正规教育培养京剧人才的学校——伶工学社等等，甚至气象、公路、铁路都是开了全国风气之先。张謇的开拓创新精神，是他的爱国主义思想的重要特征，也是他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江泽民同志在科技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张謇的一生就是一个典型，一个范例。

四、张謇的务实性是他责任意识和实干精神的融合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中国，为了摆脱帝国主义的掠夺、欺凌，为

了冲破阻碍社会进步的封建的生产关系，需要扎扎实实地发展社会生产力，需要实实在在地办好一批又一批的事业。张謇的军营生涯、试场的挫折等等实际锻炼，使他早年就注重务实、进取。张謇的爱国不是停留在朴实的思想感情上，或者豪言壮语上，而是将忧国忧民之情转化为救国救民之行。他认为“图存救亡，舍教育无由，而非广兴实业，何所取资以为挹注是尤士大夫所当荒荒者矣。”因此他以“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为信条。他重视实践，他的人生追求便是不知疲倦地把自己的信念逐步付诸实践变成现实的事业。这是使他成就许多事业的重要特性。

张謇的务实性还反映在从实际出发，因时因地制宜。张謇说：“事有所发，法古法今亦不必古，不必今，不必中国，不必外国。察地方之宜，度吾兄弟恩虑之所及，财力之所能，以达我行业之所在，不欺于人之高且大，不贬我以就人。”可见张謇在发展事业上既不盲目地排斥外地的成功经验，又不生搬硬套这些做法，既不全盘否定传统，又不一味泥古，而是从实情出发，视其条件如何而定。如他在办大生纱厂时，就分析了南通得天独厚的区域优势：一在原料方面，南通棉花质量好，量多，棉质“力韧丝长，冠绝亚洲”，棉产则“供大于求”；二在销路方面，南通关庄土布畅销国内外市场，对机纱的需要量将日益增大；三在劳动力方面，通海民众“妇女皆大足，上工能步行，做工能久站。”因而首先创办和发展纺织工业，因此，他所创办的许多企事业才有这样好的生存率和生命力。

张謇的务实性反映在教育思想方面，就是十分重视实践和实践教育。他主张在“寻常师范学校中，亦必立一小学校，为师范生实践教授之地，是小学与师范，其体用相受相成。”1906年在通州师范校内创设附属小学校，1909年在南通女子师范校内设立初高两附属小学，1921年为推广农林教育，便利师范生实习起见，又在垦牧乡海复镇设立第二附属小学。不仅如此，张謇还在农校附设农场，在医校附设医院，作为学习实习实验的基地。这些实习实验基地作用的发挥大大有助于学生基本技能的提高。张謇所特有的务实求实精神，为他一系列的实业活动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条件。他的后半生三十多个年头里，仅在南通一地就成功地创办了四十多个企事业。

张謇与谭嗣同一样，都是由维新到革命的过渡时期过渡性的人物。谭嗣同是一位坚定的维新改革思想家，其主张不仅要求维新变法，而且明显带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倾向，实为其他维新思想家所不及，他的思想和牺牲精神影响了一代的革命党人。而张謇在政治和思想上的主张没有谭嗣同那样急进，然而在救亡图存的忧患意识激励下，自强不息的毅力、务实求实的态度、开拓创新的精神则是时代的产物和时代的需要，由此所闯出的状元办厂道路，影响了一代士大夫群体，推动了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社会需要急风暴雨式的革命去冲刷污泥浊水，建立崭新的制度，同时也需要扎扎实实的渐变，不断的积累，发展社会生产力。这种渐变和积累为革命创造了阶级基础和物质条件，所以张謇与近代的先进历史人物一起，从不同的侧面，共同推动了近代社会的发展。

参考文献

张謇全集。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原刊于《近代改革家张謇》，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6 年）

试析张謇未积极参与 戊戌变法的原因

蒋国宏

1898年，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效法日本明治维新。依靠光绪皇帝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即“戊戌变法”。这场运动旨在挽救民族危亡，发展民族经济。这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全国人民特别是新兴资产阶级的愿望。作为赞成和支持变法的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作为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张謇理应积极参与、共襄盛举。但他却消极对待，并于变法尚在艰难进行的时候离开变法的中心北京。这中间既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因素。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不赞成康有为等人的变法策略

维新运动是由改良派、帝党及一些洋务派官僚共同促成的。但随着变法的深入和发展，彼此间分歧也日益明显。洋务派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观望后倒向“后党”“顽固派”一边。出身“清流”、与帝党有渊源关系的洋务派官僚张之洞抛出《劝学篇》，肆意攻击维新变法。帝党官僚也对一些变法举措表示不解和不满。

张謇与帝党魁首翁同龢本是江苏同乡。张謇的家乡通州与翁的故里常熟隔江相望。而通州张氏一族又系元末由常熟土竹山迁移而来。这无疑使两人关系更加亲近。翁同龢对张謇青眼有加，对他“大魁天下”也不无帮助。甲午后，张謇在政治舞台上更加活跃，成为帝党中坚，被列为“翁门六子之一”。张謇对变法的看法颇得翁同龢赏识和赞许，在帝党中也具有代表性。

张謇与康有为在变法的许多问题上有着“共同语言”。如在对变

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方面，他们都认为只有立即变法才能扶大厦于将倾，拯斯民于水火。康有为上书光绪皇帝，痛陈所面临的“瓜分豆剖”的严峻形势，并且警告说若不亟行变法，“皇上与诸臣虽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甚至“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张謇则在《代鄂督条陈立国自强疏》中提出变法自强的八条建议，并表示这些改革措施“非特远虑，实属近忧”，虽然得要巨额经费，但“为中国安身立命之端，万难缓图。若必待筹有巨款。必致一切废沮自亡而已”。他们都重视培养人才。康有为认为中国饱受列强欺凌的根源在于“风气未开，人才乏绝”，因此思贤若渴，大声疾呼“今变法之道万千，而莫急于得人才”、张謇也把开民智、育人才，置于自强御侮的战略高度，列为变法的重要内容。他指出“夫立国由于人才，人才出于立学；此古今中外不易之理。不蓄而求岂可幸致？”此外，在文教、经济、财税等领域的改革方面，他们也有相同或相近的看法。这些成了张謇赞成、支持康梁变法的思想基础。1895年10月张謇列名发起上海强学会分会。这在风气未开，“有闻强学会之名者莫不惊骇，疑有非常之举”，风险很大的情况下是要有勇气的，此举足以表明他支持变法的态度。1898年5月张謇来到变法运动的中心北京，更是投身到如火如荼的变法活动之中。他向维新运动的“导师”翁同龢提出若干革新建议，为变法出谋划策，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农工商标本急策》、代拟《请留各省股款振兴农工商务折》、请求停办间架税和宁属米粮捐，以及代拟《京师大学堂办法》等。

但是，张謇与康有为在一些问题上的分歧也是十分明显的。康有为主张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同步进行。张謇则力倡“实业救国”，更加关心经济及文教等领域的改革，对政治体制方面的变革：（一）主张长谨而慎之、从长计议。在变法的策略上，他们也主张各异。由于当时顽固势力与维新力量是“千一之比”，敌强我弱，力量对比悬殊，因此采取正确的策略尤为必要。康有为主张“全变”、“骤变”。这种看法在他的奏议中随处可见。他认为“守旧不可，必当变法；缓变不可，必当速变；小变不可，必当全变”；“方今不变固害，小变仍害，非大变、全变、骤变不能立国也”，主张“尽涤旧制，尽除旧俗，不留毫厘”。康有为长于著述，也擅宣传，雄心勃勃。但不少主张为书生之见，可行性不高。他对